

以色列占領區之巴勒斯坦人抗爭 對中東和平之影響

吳 釗 燮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一九九一年十月卅日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開的中東國際和會，無疑是中東近年來的大事，它為該地區的和平帶來轉機。因為中東長期衝突不斷，國際協商一直未獲成果，如今能在馬德里召開和會，確成為國際矚目之焦點。

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所占領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 of the Jordanian River）與加薩走廊（Gaza Strip），於一九八七年底發生無預警式的大規模抗爭（Intifada），^①抗爭並且持續不歇，對中東地區的主要國家都發生震撼性的影響，而成為日後中東地區國際和會召開的遠因。

當然，在中東和會的曲折過程之中，於一九九〇年爆發的波斯灣戰爭，是促使和會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召開的重要因素，但是若一九八七年底在占領區未發生大規模動亂，讓尋求和平的政治領袖把握機會推動國際和會，奠定和會的基礎，則中東和會不可能在波斯灣戰爭結束之後不久便在西班牙順利召開。本文的目的，除陳述占領區動亂的原因與過程之外，主要在探討評估動亂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的影響。

目前已有不少英文著作是在探討占領區抗爭的問題，^②而且因為占領區動亂是一九八七年底之後，至伊拉克侵略科威特

註① Intifada 本為阿拉伯文，字面意思為「擺脫」（shaking off），西方新聞媒體開始直接以此來形容這一波的抗爭行動，這用法後來便被普遍使用而成一通用名詞。

註② 例如 Michael C. Hudson (ed), *The Palestinians: New Directions*, 1990,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oost R. Hillemann, *Behind the Intifada: Labor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199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Rex Brynen (ed), *Echoes of the Intifada: Reg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1991,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Don Peretz,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1990,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Aryeh Shalev, *The Intifada: Causes and Effects*, 1991,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引發波斯灣危機爲止，是中東地區最受全球矚目的焦點，因此，世界的主要文字媒體對此都有持續性的報導，也有不少學術性與非學術性期刊論文與評論是針對這一課題加以評論分析。以這些現有的資料爲基礎，本文將把重點放在抗爭對和會召開的影響，以凸顯巴勒斯坦人在占領區的抗爭行動對中東和會召開的正面意義。

二、動亂的起因

對於占領區抗爭的起因著墨頗多，一般的結論是占領區巴勒斯坦人的地位與生活環境是促使動亂發生的最主要原因。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之後，約旦河西岸地區與加薩走廊兩地被以色列所占領，占領區內的一百多萬巴勒斯坦人自此便生活在以色列的軍事統治之下。此外，占領區更有許多自一九四八年開始便存在的巴勒斯坦難民，長期生活在赤貧的環境之下，這些難民，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在加薩走廊則高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這些難民大部份都居住在擁擠不堪而且極爲簡陋的難民營之中，過著幾爲非人的生活。^③

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在高壓統治之下，經濟生產成爲典型的殖民地型態，完全依附以色列。由於占領區的工商業遭到以色列政府刻意的壓抑，由以色列政府補貼與支持的產品，進入了占領區，與巴勒斯坦人的產品相競爭，以色列人甚至利用占領區的廉價勞力，開設生產線，與原來占領區的產品相競爭，因此占領區巴勒斯坦人的經濟活動，除了農業生產與小規模商業行爲之外，以家庭式的加工與越過邊界到以色列打工爲主。尤其是到以色列打工的人數，在加薩走廊已經達到男性就業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在西岸地區則亦高達百分之三十。^④由於占領區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打工的人數眾多，因此經濟上依賴以色列的程度便越來越深。以西岸地區的進口貨品爲例，就有百分之八十八是來自以色列，而自西岸地區出口的貨品，也有百分之六十五是輸至以色列。^⑤

到以色列本土工作的巴勒斯坦人，除了帶回有限的勞務收入外，因爲接觸到以色列本身高水準的生活，民主的思潮與政治參與，現代化的生活習慣與各種活動，尤其是親身體驗到現代化與互相尊重的兩性角色關係，使得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經由比較，而對傳統阿拉伯社會產生反省與改變。這些巴勒斯坦人不再默默接受傳統的領導，對於女性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也不

註③ Aryeh Shalev, *op. cit.*, p. 15.

註④ *Ibid.*, p. 17; Don Peretz, *op. cit.*, p. 13.

註⑤ Aryeh Shalev, *op. cit.*, p. 17.

再強力干涉，而女性由於外出工作者快速增加，經濟能力自主性加強的結果，也使女性在家庭的發言權與政治上的參與，都超過其它阿拉伯國家。^⑥

由於以色列在占領地政策上，強力徵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建立猶太人的屯墾區。在西岸與加薩走廊遭到以色列占領廿年之後，已經有上百個猶太人的屯墾區，因此巴勒斯坦人所喪失的土地就很可觀。以西岸為例，就有將近一半的土地遭到以色列政府徵收，而加薩走廊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以色列政府用來建立猶太屯墾區。^⑦占領區巴勒斯坦人原本多數從事農業生產，但在大片可耕地被以色列徵收之後，很多農民被迫離開土地，到以色列本土從事非技術的工作。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之後，經濟上能夠持續發展，有一部份要歸因於巴勒斯坦人的廉價勞力。^⑧

除此之外，占領區的稀有水資源也因為以色列人的進入，而遭到改變與限制。在加薩走廊地區因為水位過低導致水份鹽化的現象，以色列政府便限制該地區開鑿新井，但是對於猶太屯墾區則不加限制。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便存在於西岸與加薩走廊的水利系統，在一九八〇年以後，全被以色列政府所擁有的米庫羅特（Meqorot）國家水利公司所接管。在一九八四年，以色列人所用的水平均每人為一萬四千兩百立方公尺至兩萬八千立方公尺，但是加薩走廊居民的平均用水僅約兩百立方公尺。^⑨

屯墾區猶太人除了受到以色列政府在經濟方面的特別照顧之外，在政治上也享有高度的權力。最令巴勒斯坦人反感的是他們可以公開攜帶槍械至占領區的各處行走，不受任何限制。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底於西岸希伯倫市（Hebron）所發生的猶太人屠殺清真寺內巴勒斯坦人的慘案，即是一名自美國移民至西岸屯墾者所為。而巴勒斯坦人則要隨時攜帶身分證件，以備以色列軍隊臨檢盤查，若有反以色列嫌疑者，無論是否有足夠罪證，以軍都可以隨時將之逮捕下獄。至今仍有兩千多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政府監禁，其中有一千多人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序，便被捕入獄。^⑩對於被疑為反抗份子者之房舍，則常遭到炸毀的命運。拉賓政府上台之初，更有近五百名被疑與回教反抗運動哈瑪斯（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Hamas）有關的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到以色列南部的無人地帶。

在另一方面，長期暴露在尖銳不平等的經濟關係與軍事統治之下，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國度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相對

註⑥ 參見 Joost R. Hillemann, *op. cit.*

註⑦ 在一九八七年時，猶太屯墾區的數目已經超過一百個，人數已經接近十萬。Don Peretz, *op. cit.*, pp. 9, 13. 對以色列的移民屯墾政策參見 Ann Mosely Lesch and Mark Tessler, *Israel, Egypt, and the Palestinians: From Camp David to Intifada*, 1989,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p. 195.

註⑧ 詳見 George T. Abed (ed),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Studies in Development under Prolonged Occupation*, 1988, Routledge, London.

註⑨ Don Peretz, *op. cit.*, p. 11.

註⑩ *New York Times*, June 3, 1988, p. A1.

的經濟環境難見改善的機會，政治權力也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因此巴勒斯坦人遭到過度壓抑的情緒，只有訴諸極端的民族主義與宗教的力量，使得占領區原本較為保守溫和的傳統政治領袖，逐漸由較為極端的好戰份子與基本教義的宗教領袖所取代。最明顯的，就是哈瑪斯在占領區的影響力劇增，甚至威脅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身對占領區巴勒斯坦人的領導權。^⑫這些激進的領袖不斷以煽動的民族與宗教口號，激化對猶太人與以色列的仇恨，到處噴漆書寫激進口號，懸掛被以色列禁止的巴勒斯坦旗幟，並且偶爾以石塊攻擊以色列在各處巡邏的士兵，造成零星的衝突事件。而這些衝突，更加激化對立的情緒，讓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占領地政策更加不滿，使得更大規模的衝突蓄勢待發。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兩名由吉布利爾 (Ahmad Jibril) 所領導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總部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General Command) 突擊隊員，乘著電動馬達滑翔翼，飛入以色列北部一個軍事基地旁，進入基地行刺，造成六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七名受傷的事件。^⑬這次突擊行動打破了以色列軍隊無懈可擊的神話，振奮了巴勒斯坦人的好戰情緒，也使得以、巴衝突幾乎達到了沸騰點。

真正觸發反抗風潮的事件發生於十二月八日，一部以色列裝甲運輸車與一部搭載巴勒斯坦工人回加薩的卡車相撞，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當場喪生。由於巴勒斯坦人懷疑是以色列軍人蓄意肇事，引發賈巴里亞 (Jabalya) 難民營居民在喪禮時的強烈示威抗議，並且向以色列巡邏士兵丟擲石塊，而以列士兵的鎮壓又造成巴勒斯坦人的傷亡，對巴勒斯坦人已經亢奮的情緒猶如火上添油。出乎以色列政府意料之外的，這次在難民營的示威抗議行動並未在短時間之內結束，不但持續不斷，而且擴大到整個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有如野火燎原，於是全面抗爭就此開始。^⑭

這次的反抗風潮，一直持續不停，而且因為以色列軍方的強力措施，造成巴勒斯坦人的傷亡數目直線上升，更激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決心，不但在各處以石塊攻擊以色列士兵，而且杯葛在以色列的工作，使以色列的經濟蒙受損失。強烈的抗爭風潮也激起了阿拉伯國家的團結，促使國際社會正視以色列占領阿拉伯人領土的事實，也促使中東國際和談往前跨進一步。

三、抗爭對巴解的影響

註⑫ 參閱 Emile Sahliyeh, *In Search of Leadership: West Bank Politics since 1967*,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8.

註⑬ Don Peretz, *op. cit.*, p. 36.

註⑭ *Ibid.*, p. 39.

在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且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總部逐出貝魯特之後，巴解面臨了失去國際活動空間的重大危機。一方面，以黎巴嫩為基地攻擊以色列北部地區的可能性消失。另一方面，由於巴解總部遷移至突尼西亞，離開了中東衝突的中心點，巴解能夠喚起國際注意焦點的可能性劇降。因此在以色列夏米爾政府強硬政策與美國雷根政府親以政策的雙重壓力之下，巴解在軍事與外交上都已經面臨窮途末路。巴勒斯坦人在失去對未來的希望之餘，一些較小的巴勒斯坦暴力組織的恐怖活動成了他們宣洩情緒的管道。而這些恐怖活動雖能暫時取得媒體的注意，但是對於巴勒斯坦人建國的訴求卻形成了反效果。

但是由於抗爭風潮的發生，吸引了國際的注視，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又重新站上國際舞台。巴解的領袖們見到巴勒斯坦人建國的機會到了，於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旬於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巴勒斯坦民族議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第十九次會議時，決定了巴解新的政治立場，包括宣布巴勒斯坦獨立，以及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二號與三三八號決議案。^⑭

這次巴勒斯坦民族議會的結論，是巴勒斯坦建國運動開始以來所做的最重大妥協，放棄以往要在整個巴勒斯坦（包括以色列本土）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主張，而只在以色列所占領的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宣佈建立巴勒斯坦國。這個新的主張間接承認以色列存在的事實，而且間接承認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將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前景，這是巴勒斯坦的領導人之間以前所不願也不敢做的宣佈。此外，宣佈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也等於放棄了原先所不願放棄的以武裝鬥爭取回巴勒斯坦的立場，接受決議案中所載的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第十九屆的巴勒斯坦民族議會宣言的最後一段話如下：

巴勒斯坦國在此宣佈，將遵守聯合國憲章與決議案，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地區與國際的紛爭，而且在其維護領土的完整與獨立的天賦權利之時，不具任何偏見。因此，她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暴力、與恐怖手段侵犯其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也反對以這些方式侵犯它國的領土完整。^⑮

當然，巴勒斯坦民族議會的重大宣佈，如果沒有占領區的大規模抗爭，使世人注意到以色列在占領區不合人道的統治事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些妥協與讓步，在沒有國際注視的情況下，將不可能激起任何回應，而抗爭風潮便是巴解在外交

註⑭ Michael C. Hudson (ed), *op. cit.*, p. 4. 第二四二號決議案與三三八號決議案分別在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通過的。第二四二號決議案主要內容為要求交戰各方停火，交回占領土地與回復戰前疆界，各方在中東存在的權利，以及安置巴勒斯坦難民等事項，並以和平方式解決所有紛爭。第三三八號決議案則重申以第二四二號決議案的精神建立中東的和平。兩決議案條文，請參閱薛婉凌，八〇年代巴解外交政策轉變之研究，民國八二年，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第一一〇至一一五二頁。

註⑮ Michael C. Hudson, *op. cit.*, p. 5.

上不斷向前邁進的背後支持力量。也因此巴解的領袖爲了能夠使建國運動維繫於不墜，更堅持抗爭行動持續不斷的進行。^{①⑥}在阿爾及爾會議之後，巴解最高領袖阿拉法特（Yasar Arafat）受邀到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但因為美國拒絕發給簽證，因此聯合國大會決定移至瑞士日內瓦召開會議，順利讓阿拉法特發表演說。在演說中，阿拉法特明明白白的宣佈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放棄恐怖主義，與接受聯合國第二四二號與三三八號決議案。在聯大演說之後的記者會中，阿拉法特再次明白的作上述宣佈。^{①⑦}因爲阿拉法特所作的歷史性讓步，使得美國再也沒有理由反對與巴解對話，因此授權駐突尼斯的大使派勒特勞（Robert Pelletreau）與巴解官員展開對話，這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歷史性的外交突破，讓以色列無法再利用美國不與巴解對話作爲盾牌，堅持不參與中東和會，並交出所占領的阿拉伯土地以換取中東的長期和平。

對於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雖然是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政治組織，但是由於巴解總部與占領區巴人的隔離，再加上以色列對巴解的強硬武力對付的政策，因此巴解除了在外交方面有所發揮以及對巴勒斯坦解放軍（Palestinian Liberation Army, PLA）的統帥之外，對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受困於難民營中的阿拉伯難民，其領導只具象徵作用，無法真正的組織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民，從事有效的政治運作。^{①⑧}因此在抗爭風潮發生之後，巴解體會到領導權旁落到新一代激進領導者而且不受巴解節制的危機，便開始透過地下管道，尋求領導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方式。

對於抗爭活動的本身，巴解成立了統一指揮系統（Unified National Command of the Uprising, UNCU），聯合了各種自發性的小團體，巴勒斯坦人的各個派系，以及哈瑪斯回教反抗運動，有效的協調原本各自爲政的局面，讓抗爭活動能夠全面持續進行，而且透過統一指揮系統的運作，巴解的訓令也能夠以地下傳單的方式很快傳遍占領區各地。占領區原本散漫的勞工組織、婦女組織、學生組織等，也都紛紛組成全面性的統一組織，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實質領導權有很大助益。^{①⑨}

由於占領區巴勒斯坦人持續的抗爭行動牽涉到他們罷工所蒙受的經濟損失，被以色列軍人槍殺或拘禁之後的撫恤，房舍遭以色列軍隊炸毀之後的補償，以及約旦宣佈放棄約旦河西岸主權之後的行政體系人員薪餉等，所費龐大，若無固定財政來

註①⑥ Ibid., p. 14.

註①⑦ Ibid., p. 4.

註①⑧ 作者曾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至約旦境內一難民營訪問當地難民，在他們的理解之中，雖然巴解接受了無數的產油國金錢援助，但是那些錢從不到達難民手中，難民的教育與其它生活必需的經濟來源，是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所發放的，而且數目上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對難民而言，巴解與他們之間發生關係的時候，是年輕一輩的難民加入巴勒斯坦解放軍的時候。亦參見 Kemal Kirisci, *The PLO and World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Mobilization of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1986*,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註①⑨ 參見 Joost R. Hiltmann, *op. cit.*, Michael Curtis, "The Uprising's Impact on the Options for Peace," *Middle East Review*, Vol. XXI, No. 2, Winter 1988/89, p. 5.

源，巴勒斯坦人勢必被迫向現實低頭。以色列政府也瞭解到巴勒斯坦抗爭的這一項弱點，因此比以前更嚴加檢查進入占領區的資金，任何個人只許攜帶兩百約旦的拿（約為五百元美金）的數額，這僅為原來所許可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已。^②但是儘管以色列政府嚴加查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仍然利用各種管道，尤其是利用進入以色列的外國遊客與國際銀行的轉帳功能，將大筆資金匯入占領區，這些流入的資金據保守估計約為每個月一千萬美元，但是較寬鬆的估計則可能高達每年三億美元。^③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很急切地要擴大並延續占領區的抗爭行動，便是因為抗爭帶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人處境的注視與同情，使中東國際和會能早日召開。而為了能夠表現巴解參與國際和會的誠意，巴解在國際上對本身長久以來所堅持的一些立場做了一些重大讓步。

四、對以色列的影響

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占領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之後，便一直實施軍事統治。對於有「恐怖份子」之嫌疑者，可逕行拘禁逮捕，有些會經過法律程序加以定罪，有些則未經過任何法律程序而予以長期拘禁。若有房舍被疑有做為「恐怖活動」的中心，或藏有「恐怖份子」，則加以爆破炸毀。以色列對於「恐怖份子」的解釋相當寬鬆，只要對以色列或猶太人懷有強烈敵意者，都可以算做是恐怖份子，而占領區巴勒斯坦人幾乎人人對以色列國或猶太人深懷敵意，因此巴勒斯坦人人人都有恐怖份子的嫌疑。對以色列士兵丟擲石塊者是恐怖份子，牆上噴漆者也是恐怖份子，在宗教或政治上鼓吹巴勒斯坦人建國或阿拉伯人意識者也是恐怖份子，未隨身攜帶證件者有重大嫌疑，而隨身帶著家庭用刀刃者更確定是恐怖份子。在這種情況之下，任意逮捕、毆打、拘禁的情形經常發生。在占領區之內以色列還有國際視聽的顧忌，在一九八二年入侵黎巴嫩的時候，在戰爭情況下便沒有顧忌了，用子母彈（Cluster Bomb Units）以及飛機大砲攻擊平民區或難民營，認為是在掃蕩恐怖份子，坐視黎巴嫩馬龍派基督教徒（Maronite Christians）屠殺難民營中難民，也認為是恐怖份子遭到應有的懲罰。^④這「鐵拳政策」（Iron Fist Policy）持續進行，雖然不斷受到國際社會的責難，但因為這兩地是以色列在戰爭中所占領的地方，以

註② Aryeh Shalev, *op. cit.*, p. 96.

註③ *Ibid.*, p. 96.

註④ 西方媒體記者對以色列的政策與態度著墨頗多，即使是猶太裔且親以色列的記者有時也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多所批評。參閱 Thomas L.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1989, Anchor Books, New York, p. 163; Jonathan C. Randall, *Going All the Way: Christian Warriors, Israeli Adventurers, and the War in Lebanon*, 1984, Vintage Books, New York, pp. 254-5. 雷根總統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在其回憶錄上亦對此有記載。詳見溫伯格，*為和平而戰——五角大廈關鍵性的七年*，鄭念祖等譯，民國八十一年，修訂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第一四〇頁。

軍事方式加以統治是必然的，尤其美國長期以來默許以色列的統治方式，所以以色列也就有恃無恐。

在抗爭發生之後，以色列政府仍然延用一貫的「鐵拳政策」，以實彈射擊丟擲石塊的巴勒斯坦人，或將抓到的抗爭者加以毆打，炸毀領導抗爭者的房舍。數據顯示，在抗爭發生後的兩年之間，有七百九十五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士兵槍殺死亡；在抗爭發生之後的三個月間，就有至少三千五百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士兵的毆打而造成骨折或其它傷害，其中有許多是永久性的傷殘；在抗爭發生後的兩年間，約有一千棟房舍遭到炸毀；有一些城鎮或難民營，甚至被持續宣佈宵禁達數十日之久，造成一般民眾極為嚴重的民生問題。^②以色列政府認為這種強硬的政策可以摧毀巴勒斯坦人的意志，從而達到控制甚至消滅抗爭的目的。

在參與中東國際和會的態度上，以色列政府的立場也相當強硬。雖然聯合國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交出所占領的阿拉伯領土，但是以色列辯稱該決議案並未明定交出那些領土，若要交出領土的話，在一九七九年與埃及達成和平協議時已經將西奈半島交還埃及了，易地求和的問題已不存在。若要召開國際和會，以色列也立下條件，要求阿拉伯國家先承認以色列，而且談判只能採取大衛營一對一的模式進行。關於猶太人在占領區移民屯墾之事，以色列則不理會各國的抗議，不斷進行，使得占領區的猶太移民數在抗爭風潮發生之前，便已達到十萬人之多。阿拉伯國家懷疑以色列以移民的方法，尤其是以美國的經援，接納歐洲與前蘇聯的猶太移民，安置於占領區的方法，迅速增加占領區中猶太人人數，企圖改變占領區的人口結構，以便在適當時機加以兼併。保守的自由黨(Likud Party)領袖更不斷宣稱，絕不放棄占領區的任何一寸土地。這種強硬立場，使得中東和會的各种提案，難以被各方接受，而且即使召開，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由於占領區在一九八七年底的抗爭風潮，接着約旦宣佈放棄西岸主權，以及巴解領袖阿拉法特的高度妥協性宣示，導致美國展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的對話，而對以色列造成強大的外交壓力。尤其西方電視媒體對抗爭的報導，重點是在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人的強力鎮壓，巴勒斯坦青年與兒童遭到槍擊死亡的數字直線上升，以及巴勒斯坦青年遭到以色列士兵殘暴對待，一幕又一幕血淋淋的鏡頭日復一日呈現在世人面前，對於以色列的國際形象傷害極大。不但是在西方最支持以色列的國家與團體開始懷疑他們本身的親以價值觀，便是以色列國內對占領區的政策也開始反省，並且開始出現要求立即和談的團體(Peace Now)。甚至是聯合國秘書長裴瑞茲(Javier Perez de Cuellar)也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卅日公開呼籲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施以壓力，以改善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③

即便是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也因為抗爭風潮而增加對以色列的敵意，並且同情的加入抗爭行動。各式各樣的抗爭行

^② Rex Brynen, *op. cit.*, pp. 33~4.

^③ Michael Curtis, *op. cit.*, p. 4.

動，包括丟擲汽油彈、放火、丟擲石塊、放置路障等等，都被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人採行。對於這些同情性抗爭行動的頻率，各種報導的數據不太相同，從數百到數千都有，但是這些行動顯示抗爭行動已經蔓延到以色列國內，對以色列的安全與秩序都形成威脅。^⑤

抗爭對以色列經濟的傷害也相當大，原來以色列經濟所賴以運轉的下層結構是占領區的廉價巴勒斯坦勞力，但是抗爭領導者的有效杯葛行動，使得以色列的經濟成長益形遲滯，對高達百分之百的通貨膨脹率與僅有百分之二點六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而言，自是非常沈重的經濟壓力。^⑥數據顯示以色列在一九八八年消耗在占領區的軍事費用便高達一億五千萬美元，其它的減產、外銷減少、觀光收入減少等，也使以色列的經濟蒙受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損失，國民生產毛額也降低了兩個百分點，傷害不可謂不大。^⑦

由於抗爭對以色列人造成嚴重的心理壓力、外交壓力、與經濟上的負擔，使得以色列政府必須重新考慮是否參與中東國際和會的立場。尤其在雷根政府與埃及總統慕巴拉克（Husni Mubarak）的積極遊說之下，讓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所提議的和平建議，成為各阿拉伯國家所願意接受的計畫，這項和平計畫甚至受到培瑞茲（Shimon Perez）所領導的勞動黨（Labor Party）的支持。惟當政的夏米爾（Yitzhak Shamir）政府卻以和會形式之程序性問題而拒絕與巴解「恐怖組織」對談，馴至拒絕和會的召開，直至波斯灣戰爭之後才改變態度。由於以色列多數人民已經體認到中東和會的成功是該國在中東能與鄰近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一九九二年大選時，強硬派的夏米爾所領導的自由黨便嚐到敗績，被較具妥協性的勞動黨領袖拉賓（Yitzhak Rabin）所取代，也象徵「以土地換取和平」的時代的到來。

五、結 論

中東國際和會順利召開是達成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避免再度遭受戰火蹂躪的基礎。但是這次和會的召開，並不是一和平安定的環境之下的產物，而是在經過以色列占領區幾年的強力抗爭之後的結局。當然，中東國際和會召開需要其它條件的配合，如希政府較為持平的以阿政策，埃及總統慕巴拉克與約旦胡塞國王（King Hussein）的奔走，阿拉法特的態度趨向妥協，甚至冷戰走向結束的大環境，以及波斯灣戰爭所帶來的震撼等等。然而近年來研究中東的論著幾乎一致的

註⑤ Rex Brynen, *op. cit.*, p. 109.

註⑥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2, p. 219.

註⑦ Michael Curtis, *op. cit.*, p. 4. 石業三：「阿拉伯聯盟阿爾及爾會議」，問題與研究，第廿七卷，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九年九月，第六五至六七頁。

*

認爲占領區在一九八七年底所爆發的全面抗爭行動是一大關鍵。的確，若沒有抗爭行動，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外交上幾乎沒有着力點，以色列也不會體認到西岸與加薩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國際社會上也不會關注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力促和會的召開。

本文分析了巴勒斯坦人在占領區的艱困處境，抗爭的爆發，抗爭對巴解以及以色列的影響等，讓吾人體會到原本是一件使中東地區動盪不安的事件，卻可以演變成促成和平的重要因素。中東地區若能透過國際和會而達成永久性的和平，則巴勒斯坦人因抗爭所受的傷害損失，便具有正面的意義。

*

*